



“东亚革命的歌者”

——蒋光慈及其文学创作 □侯敏 刘丽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浸润着无数革命者奋斗的汗水和滚烫的热血。在这诸多的革命者中,蒋光慈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是中国“普罗列塔利亚”的最初代言人。他曾言:“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烈火。我愿勉励为东亚革命的歌者。”(《新梦·自序》)蒋光慈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况,同拜伦作比,并将“革命”视为一生的追求与信仰。他以敏感的心灵捕捉动荡时代的脉搏,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粗犷的呐喊之声寻找拯救人民于火海的救亡图存之路。他誓言要为祖国与人民征战一生,洒尽最后一滴热血。可以说,蒋光慈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因此,只有将蒋光慈放置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这位革命拓荒者对于中国革命史和新文学发展史的特殊意义。

蒋光慈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对阶级、民族压迫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与感受。中小学期间,他偏爱陆游的爱国诗章,自号“侠生”,其寓意就是希望将来能做一个侠客,惩治贪官污吏。1920年,蒋光慈通过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的介绍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此间,他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革命理论著作,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开始深入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此时,蒋光慈不仅从理论上丰实自身,还积极从事革命实践活动,他印发传单、做工、游行,深入群众当中,完全把自己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

1921年,蒋光慈接受党组织安排,怀着朝圣的激动心情,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历经艰险投身革命之都莫斯科的怀抱,在这里度过了为期4年的留学生涯。苏俄经历对蒋光慈革命文学思想的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间,他努力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阅读了大量俄国古典名著,对托尔斯泰、高尔基、勃洛克等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有所涉猎。此外,蒋光慈还积极参加苏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各项活动,体验十月革命后苏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建设。他

曾在克里姆林宫现场聆听列宁的讲话,在红场与列宁一起参加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同时他还曾参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莫斯科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蒋光慈将革命圣地莫斯科视为“亲爱的乳娘”与“第二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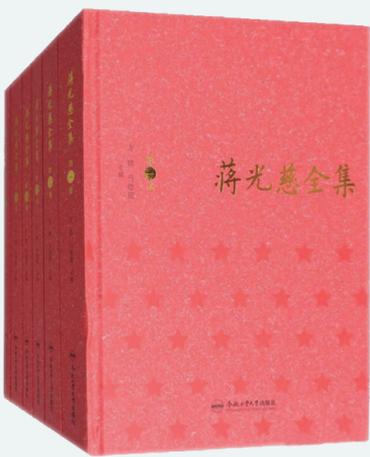
蒋光慈怀着如焚的激情,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深情地礼赞“乳娘”的养育之恩,并开始的思想养分最为丰富的革命之都莫斯科孕育自己的诗篇。《新梦》集便是诗人在革命之都创作的第一部红色革命诗集。在诗集中,他深情地赞美“莫斯科的雪花白,莫斯科的旗帜红”(《莫斯科吟》);热烈地吟唱“莫斯科的旗帜把我的血液染红了”(《新梦》);奋力地呼吁“远东被压迫的人们起来吧,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哀,快啊!快啊!……革命!”(《太平洋中的恶象》)蒋光慈的这部诗集,在当时极大地适应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鼓舞了青年的斗争情绪,充分彰显出这部写于苏俄、出版于五卅前夜的诗集的重大时代与历史意义,正是基于此,钱杏邨曾在1928年发表的《蒋光慈与革命文学》一文中评价《新梦》“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

俄国十月革命的耳濡目染,促使蒋光慈在回国的岁月里,始终将“革命”作为文学创作的中心语汇,将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视为拯救苦难中国的“圣经”。蒋光慈回国后的文学创作,以1927年的《野祭》为标志,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诗集《哀中国》延续了《新梦》中反抗战争的基调,只是真挚的赞词被沉痛的叹息所替代,革命现实主义的怅惘掩盖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但作品中浸染的依然是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哀中国》创作同期,蒋光慈开始了小说创作。蒋光慈是第一个以革命视角为出发点从事小说创作并获得较高成就的作家,从其作品中,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领略到革命小说的风采。《少年漂泊者》回答了时代青年的道路选择问题,彰显了在道路选择过程中,革命世界的先进性与其优越性。因此郭沫若曾言,《少年漂泊者》是“革命时代的前茅”(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短裤党》创作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发生后

“蒋光慈当之无愧是虔诚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战士,是忠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他的革命思想虽留有草创期的痕迹,但他于最黑暗的岁月,呼唤理想,诅咒现实,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已成为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史中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与资源。”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虽因有报告文学的特点而略显粗糙,但却显示了作家为革命斗争自觉服务的责任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咆哮了的土地》(后更名为《田野的风》)是一部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研究早期农民运动的长篇小说,也是蒋光慈生前的最后一部力作,标志着作家的革命思想已经走向成熟。

蒋光慈不仅在革命诗歌和革命小说方面有着重要建树,而且在革命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文学具有阶级性:“因为社会中有阶级的差别,文化亦随之而



含有阶级性……现代的文化是阶级的文化!”另外,当时很多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不甚了解,甚至狭隘地认为当无产阶级成为领导者后会粗暴地践踏和摧毁人类文化遗产。蒋光慈依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表明了批判地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共产主义者对于帝王的冠冕可以践踏,但是对于诗人的心血——海涅的《织工》、歌德的《浮士德》,仍是歌颂,仍是尊崇!”“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这种责任,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负担。”这就辩证而有效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建设新文化与继承旧传统之间的复杂问题。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蒋光慈强调革命作家必须自觉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责任与使命,认为革命作家需同时具备“革命情绪的素养”、“对于革命的信心”,以及“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三项素质,并主张以此作为评判作家是否革命的标准。

蒋光慈不仅从文学创作和理论层面宣扬革命,而且还与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组建社团,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阵地,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拓荒者和开辟无产阶级文艺批评



阵地的战斗者。1924年11月,蒋光慈与沈泽民、王秋心等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革命文学团体春雷文学社,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刊物《春雷文学专号》,希望能以微薄之力抵抗现代文坛的靡靡之音。1927年,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展开,蒋光慈与洪灵菲、钱杏邨等人成立革命团体太阳社,太阳社的文艺刊物《新流月报》后更名为《拓荒者》,成为中国“左联”的机关刊物。另外,蒋光慈与瞿秋白合编的《俄罗斯文学》成为介绍苏俄文学,传播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经验的珍贵论著,对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建设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百年风雨兼程,世纪沧桑巨变,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历史的晨烟暮霭,蒋光慈当之无愧是虔诚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战士,是忠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他的创作实践虽坎坷短暂,但却孜孜以求、倾尽一生,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初实绩;他的革命文学理论虽不够系统周详,却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他的革命思想虽留有草创期的痕迹,但他于最黑暗的岁月,呼唤理想,诅咒现实,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已成为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史中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与资源。可以说,蒋光慈是在倾尽一生来实践自身的革命理想,诠释自己的革命信仰。因此,他当之无愧是普罗文学的“师”,是东亚革命的歌者,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中不能忘记的先驱。

■新作快评 胡学文中篇小说《白梦记》、《长城》2021年第1期

存在的焦虑或者以实写虚

□王春林

胡学文在近些年的创作实践中千方百计地尝试突破,新作《白梦记》就是代表。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突然吴子宽和杨红的独生子,从小受到了来自父母的百般溺爱。成人后的突然,竟然变成了一个甚至经常欺骗自家父母的恶棍。

小说中,突然因过失杀人,面临着牢狱之灾。但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自称是突然朋友的刚子经过一番幕后运作,原本很可能被判不少年头的突然,到头来竟然只是被判了六年的有期徒刑。这位突然现身的刚子,到底和突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进一步说,刚子到底为什么要主动帮助突然减刑?尤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刚子还送给吴子宽夫妇20万元现金,而且还一再强调,这笔钱本来的主人就是突然。既如此,另外一些问题也就继续浮出水面。这笔巨款真是属于突然的么?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突然这个总是在招摇撞骗的社会混混,又是怎样赚到如此一笔巨款的?所有这些,在困扰广大读者的同时,更是在困扰着吴子宽和杨红夫妇。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以上这些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构成了某种内在的驱动力,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演进发展。

在常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以上这些问题,都会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而得到解决,而这也就意味着问题答案的最终浮出水面。但在胡学文的《白梦记》中,却不仅不痛痛快快地给出以上问题的答案,而且越是到后来,越是变本加厉地稀里糊涂。尤其是到小说结尾,被杨红的二舅百般逼迫的吴子宽,竟然被自己的噩梦吓醒:“半夜,吴子宽被噩梦惊醒。几个公安闯入家中,翻箱倒柜,搜出那张巨额存折。杨红这个不知死活的货,竟扑上去抢夺,还咬了公安的手臂,公安将枪口对准她。吴子宽惊醒过来,大汗淋漓,心跳如擂,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他撒了泡尿,躺下,却再也睡不着。脑子里翻滚着那个梦,伴着混杂的声音,然后,他听到了,却不是幻觉,实实在在,真切切切。他慌张爬起,从大门翻出,跌入黑漆漆的夜。”吴子宽之所以会在半夜被噩梦惊醒,其实还是以上那一系列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缘故。既然从常理出发怎么都无法解释,那其中肯定就隐藏着更大的祸患。请注意,吴子宽的推理判断乃是建立在他对儿子突然某种自以为是的理解前提下的。但其实,读过小说的我们都清楚,身为父亲的他对业已成为社会混混的儿子根本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因为吴子宽一味地认定其中很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祸患,所以才有了小说结束时他半夜跑回家中那一幕。这个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把那笔巨款交出去。在他的理解中,导致自己一直惴惴不安、焦虑不已的根本原因,就是这天而而降的意外之财。既如此,把它交出去,也就心安了。虽然他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妻子杨红的坚决反对,但小说中的他以及执意要这么干了。在断开一个段落,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晚上,吴子宽拨通了刚子的电话。”拨通了之后的情况怎么样?胡学文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具体交代,整部中篇小说到此,以一种开放性的方式戛然而止。

实际上,并不只是这个没有作更进一步交代的开放性结尾,依我所见,胡学文打心眼里就没准备给以上问题以交代。他所需要的,只是如同阿基米德的支点那样一个事由。借助于突然的过失杀人这一事件,吴子宽由此而生成的虽然无以名状但却实实在存在在着的精神焦虑得以表达出来,这才是胡学文写作这篇小说的根本动机。如果说卡夫卡借助于格里高尔变身甲虫,企图深刻地表达一种现代人精神的被异化处境,那么,胡学文借助于突然的过失杀人所要真切思索表达的,就是现代人心灵中必须有的存在焦虑。整部小说从表面上看,都是在认认真真地写实,但总体读下来却给人一种茫然的感觉。此诚所谓“以实写虚”者是也。说实在话,能够把一部中篇小说不动声色地经营到这样的地步,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评论

残酷镜像里的温情写实

——张学东小说集《小幻想曲》读记 □傅逸尘

于温情的日常。

如果一个作家笃定地去反映生活中的苦难,那么他的文字大概是低沉的、悲伤的。张学东特别擅长用悲剧化的叙事策略,掘出生活的隐秘,震撼读者的心灵。《安魂曲》讲述的就是一个精致但却悲伤的故事,读后会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重。小说开篇的第一个场景,寥寥几笔就预示了整个故事的走向:一个老头、一个孩子、一个仅有半面门扇能开合的破旧门楼。丈夫在外务工,女人在地里干活,这是多少农民工家庭状态的真实写照。农忙时节,丈夫的工友突然来到家里,还捎来了一大笔钱,就这样,平静的生活突然被一个男人打破了。其实,故事读到这里,读者可能就已经猜到结局,丈夫去世了。接下来,张学东笔锋陡转,铺展开平静而欢乐的气氛。男人给孩子们带了礼物,帮女人干农活,把家里的门楼修葺一新。就在女人憧憬着未来幸福生活的時候,还听到那个男人吹奏的笛声,婉转欢快里却有种“奇怪的酸楚爬上心头”。男人待得越久,女人就感觉这个家越完整越幸福。欢乐总与苦痛相互交织,女人感到这种幸福真实极了,不由得担心这是虚幻的、抓不住的泡影。所以当第二次听到这笛声时,她哭了。这时,男人还是没有告诉她真相。直到孩子无意中把一只男人带回来的黑褐色的匣子打翻在地,男人再也隐瞒不住了,捧着地上的骨灰道出了一切。

张学东这些年一直穿梭在不同的题材领域,既书写《安魂曲》这样的乡村“苦难”,也关注城市里现代生活的“病症”。《被狗牵着的女人》探讨的就是一个都市家庭的伦理与情感悖论。素芬是一个离异退休的女人,卡布是陪伴她多年的宠物狗。在城市老年人的生活中,养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张学东的思考和发现就是从这种看似熟悉且平淡的生活开始的。

正如小说的标题所提示的那样,女人遛狗的时候,是女人牵着狗,还是狗牵着女人?那些喜欢遛狗的人,都有这种感触。在一些养狗的老人看来,狗已经成为家庭成员之一,在社会伦理中扮演着类似孩子的角色,“也有那眼睛,也有那嘴巴”。卡布聪明伶俐,懂得素芬的喜怒哀乐。素芬也喜欢被卡布牵着,打发时光。突然有一天,刚休完产假的女儿央求素芬帮着带外孙暖暖。在素芬眼里,暖暖和卡布都是自己的亲人,她都一样地疼爱。女儿不理解母亲,经常抱怨母亲怎么能啥好吃的都给狗吃,连给暖暖高价买的奶粉也不放过。素芬被两个生命同时牵着,她迟早要做出选择。果然有一天,卡布意外咬伤了暖暖。

小说从第一个场景女儿把外孙带回家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伦理选择。表面上看,这是狗与外孙的冲突,本质上是父母与子女的冲突。在素芬眼里,女儿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好像做妈妈的永远欠着她。相比于女儿,卡布才是自己忠实的陪伴者。她把自己的感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在卡布身上,当在外的女儿突然又闯进自己的生活时,素芬无法做出选择。直到故事结束,素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选择,无论是选择卡布还是选择外孙暖暖,都面临同样的伦理困

境。也许,在不少人眼里,这并不是个问题。不过,小说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城市退休老人生活的空虚、与子女的疏离,尤其是能否帮助子女抚养孙辈、如何抚养孙辈这一系列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痛点。

母女间围绕育儿产生的冲突勾连出家庭关系的前史,延伸出素芬婚姻情感生活的不幸。心底深处的恶与坏在矛盾中释放,其实是基于对过去苦难生活的补偿心理。结尾处,素芬的肿瘤又复发了,伴随着亲情关系的异化,肿瘤恰恰成为现代社会家庭伦理关系崩塌的一种隐喻。小说在揭示现实矛盾的同时,也在试图开掘城市老人的情感与精神困境。

张学东敏锐地注视着小人物的生活,捕捉、表呈他们的快乐与悲伤,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品客》是一篇具有寓言色彩的小说,围绕超市中常见的一个场景“免费品尝”展开叙事。“品客”是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形象。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习惯,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无非是收入不高而又喜欢购物,于是练就了不花钱又能享受到购物乐趣的功夫。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庭妇女,把消费当作娱乐。当然,“品客”有时难免会遭人白眼。这时,女主人公就会自我排解,售货员“不就是挖空心思要卖东西吗,而我偏偏揣着啥都不买的念头。再说,要生这种闷气,没准我早就气绝身亡了,哪还敢轻易上街瞎转呢”。这种深层的心理描写好像钻到了人物骨子去,“我”仿佛也比售货员更加精明和大度。因为“我”看穿了售货员的全部心思,而且原谅了她。这种精细的心理刻画,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底层”小人物的消费观和生活困境。

张学东还特别擅用意象来形容小人物的生活。“面对铺天盖地的商品,人立刻就渺小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像试图搬食物的小蚂蚁,有种被裹挟其中又难以自拔的惶惑。”蚂蚁是渺小的,比卑微渺小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生命是被动的、他律的,被外力牵引而难以自控。看似勤劳忙碌的生活,却只是像蚂蚁一样,受到本能欲望的驱使,丝毫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向。张学东还专门设置了儿子这个角色。女主人公在超市一路免费品尝时,偶然碰见了陪女孩大肆购物的儿子。看到这个场景,女主人公省钱的幻想一下子就被戳破了。文章的结局也颇具反讽意味,女主人公突感肠胃不适,先前免费品尝的东西全部呕了出来。自己精打细算省钱的努力终究归于徒劳。先前的段落写得很逼真具象,最后的结局好像是一种幻觉,作家专门做了虚化处理,一切都是想象出来的。消费时代,买还是不买,这是个问题,社会发展这么快,对小市民而言是否好事?这是现代社会、现代生活、孤独的个人才有的现代病。

张学东的小说就像一张张时代生活的照片。或许,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生活太熟悉了,以至于一看到开头,往往就能猜到故事的结局。不过,这并不妨碍我读他的小说的时候依然充满期待,期待故事渐次展开时那些打动人心的细节,也期待那个被作家装入镜子里的世界,朴素而无、丝毫没有遮掩,让我们得以仔细、耐心、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反思这个世界。